



任仁发《绘九马图》卷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元代上海，那个擅长治水的画马名家

中国以马为主题的画作，成形于汉，兴盛于唐，到宋元则名家名画辈出。任仁发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精通水利的高级别官员。

万水归海

沈思睿

上海人氏

1952年4月，当时还隶属于江苏省的青浦县境内龙固区章堰乡北庙村的高家台（今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新丰村高家台）村民在农田耕作时，无意中发现一些石碑及瓷片。后经文物管理部门勘察，认定其为元代家族墓葬，但已被盗掘。

其后，陆续从现场整理出一些墓志和墓碑，其中有一块较为完整的墓志，高约90厘米，宽约50厘米，风化侵蚀严重，大部分字迹斑驳，极难辨认。所幸碑下半部埋于土中，有几行字保留较完好，依稀可辨：“□□□□□□□□明□月山□居嘉禾青龙……”专家们也正是凭着这条线索，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

这里的“月山”是任仁发的号，而“□明”就是“子明”，任仁发的字。万历《青浦县志》（卷三）有记：“浙东宣慰副使任仁发墓在骆驼墩，四十五保四区，七座。”

“墩”通常是指边塞地区的警备构筑物，也称“烽墩”“墩台”。万历《青浦县志》（卷五兵防）记：“烟墩，前代设此墩台，皆以防倭警，今即所存者书之，多修复也……骆驼墩在四十五保四区。”元末明初，在受倭患严重威胁的江南沿海一带，朝廷修筑大量防御设施，骆驼墩就是其中之一。

志书中说的“四十五保四区”是指新江乡的辖区。上海地区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记载华亭县风土人情的南宋绍熙《云间志》（上卷）中写道：“新江乡在县北七十里，四保十二村，管理二新江松宅。”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格为华亭府，领华亭县。一年后，华亭府改名松江府。元至二十九年（1292年），位于华亭县东北的长人、高昌、北亭、新江和海隅五乡被划出单独设立上海县。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又从华亭县分出西

北部的修竹、华亭二乡，上海县分出新江、北亭、海隅三乡，建置青浦县。任氏家族其他成员的墓志中都明确记有“松江府上海县人”“世居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葬于新江乡松泽里郭巷泾祖莹”等字样（松泽里即为松宅里）。这些信息与历代方志中的内容基本一致。而郭巷泾，在万历《青浦县志》（卷五水利上）中也可查到，为艾祁浦支流，流经区域就在“四十五保”。

任仁发卒于元泰定四年十二月（1328年1月），享年73岁。由此倒推出其出生年份应为南宋宝祐三年（1255年）。生于华亭，葬于上海，说他是上海人，恰如其分。《大明一统志》（卷九松江府人物）中也将他记为“上海人”。



▲松江浦东夏村“浦江之首”景区中的任仁发雕像 沈思睿 摄

▶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局部）



治水能臣

据正德《松江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名臣）任仁发传记记载：“十八中乡试，元兵南下，平章游公见而器之，委招安海岛，引为青龙水陆巡警官，累迁武都水监，府境开江置闸，凡水议皆仁发主之……仁发皆尝治之，具有迹效，任守宰民多立祠祀之……”

任仁发以举人身份毛遂自荐，获得赏识，被安排在官署中担任宣慰使（官府中佐助官员的通称），此后不久便升任青龙巡官，开启仕途。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任仁发官至海道副千户，后以功转正千户。“千户制”始于元代，是军政合一的管理制度。

身为地方官吏，目睹水患之危害，百姓苦不堪言，任仁发决心在疏浚方面下一番功夫。当时，任仁发就曾进言：“早治则工费省而易为，晚治则工费倍而难办。”可惜未被采纳。大德年间，他再次上疏，强调吴淞江河道淤塞之害，太湖东泄之水泛滥，殃及百姓，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朝廷应允后，特命中书平章政事彻里主持工程，任仁发负责实施。疏浚从大德八年（1304年）十一月开始，九年二月告一段落，疏浚河道三十八里。史料载：“开吴淞江西自上海县界吴淞旧江，东抵嘉定石桥洪，迤邐入海，置水闸……物无疵病，民无天阨，而事竟集。”

任仁发因此受到朝廷器重，被元

成宗召见，提拔为都水监丞（六品）。大德十年（1306年），任仁发在前有基础之上再次修浚赵（七）浦、大盈浦、白鹤江、盘龙江、旧江等。对此，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五江南三）、嘉庆《松江府志》等皆有记载。这些工程进一步排导吴淞江及周围湖泊的积水，太湖流域水患得以缓解。

但元朝在治水疏浚的问题上始终没有统一和长久的考量。据《元史》（卷二十一）记载，江南行都水监设立于大德八年（1304年）五月，但在仅4年之后的至大元年（1308年）正月就被裁撤。是年，任仁发调任嘉兴府同知，时年54岁的他开始总结治水生涯之得失，动手编纂《水利集》。

《水利集》原本已佚，后世流传皆为抄本。清代倪灿、黄虞稷、钱大昕等学者合纂的《辽金元艺文志》中记为“任仁发浙西水利集十卷”，而徐光启《农政全书》、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用皆称“元任仁发水利集”。如此繁杂的书名，可能就是不断传抄所致。目前国内常见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所藏的明代抄本。但据学者考证，此抄本并不完整。

《水利集》作为元代重要的治水文献，对后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明代辑录有关元代太湖水利情况的内容，如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三水利）等，都大量摘录任仁

发的《水利集》。

任仁发于大德年间所作的“水利议答”是《水利集》的核心部分，也是这部文集最初成书的章节，着重体现了任仁发治理浙西水利的核心观点。

当时正是他受命首次大规模治理吴淞江河道之际，面对种种误解甚至是非议，任仁发顶住巨大压力，自设二十个问题“议答”，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应各类质疑。

如有人直指开挖江面和设置水闸的举措，而任仁发借助前辈的成果及自身丰富经验，明确回答道：“古人论泄水之法极详。范正公曰：三分其时，损堰二焉。谓如一日十二时，昼夜两潮，四时辰潮涨，八时辰潮落，所设之闸，昼夜皆去水之时也。所以终江面二里之宽，不如十闸之功也……吴淞江置闸十座以居其中，潮平则闭闸而拒之，潮退则开闸以放之，滔滔不绝，势若建瓴，直趋于海，实疏通积水之上策也。”

吴淞江是典型的感潮河流，借助自然之力，在吴淞江设水闸，潮水平稳时就关闭水闸阻挡潮水，潮水退去时就打开闸口排泄积水，就像从屋顶往下倒水一样，滔滔不绝，直排入海。任仁发言简意赅，理论联系实际，较为科学地解释了疏通积水的策略。

此后，任仁发在嘉兴府、大都（今北京）、崇明任上先后从事水利相关工程。泰定元年（1324年）之后，朝廷再议开江之事，又想起这位治水能臣。年近古稀

的任仁发再被委以重任，在左丞朵儿只班的领导下负责实施。工程持续三年，除拓宽疏通河道之外，又在嘉定州之赵浦，上海县之潘家浜、乌泥泾三处置水闸六座，他也因功加封都水庸田副使。

2001年，上海闸北区志丹苑工地发掘出的元代水闸遗址，经专家考证，基本确定就是泰定三年（1326年）任仁发主持修置的“赵浦闸”。

泰定四年（1327年），就在任仁发临终前，这位老臣仍然领命奋斗在治水一线。是年十二月，他在家乡青龙镇逝世，官至中宪大夫、浙东道宣慰使司副使（正四品）。世人对他的赞美之词，与任仁发同时代的元末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在《水利集》的跋中写道：“走江乡，冒寒暑，忘寝食，靡惮劳瘁……泽利在人心，名利满天下。”《新元史》编纂者柯劭忞言道：“仁发治河为天下最，大工大役皆臣皆委之。”

丹青传世

任仁发一生为官，同时“尤善画，其熙春、天马图，仁宗诏藏秘监”。他的绘画灵感多源自对生活的观察及学习等。

任仁发的早期鞍马画代表作《张果见明皇图》描绘了唐玄宗李隆基与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及其弟子相见的传奇故事。画中人物神情生动，衣着细节飘逸，极为工整，奔跑的小驴为点睛之笔，增强了画面的故事性。画幅左下款署

“云间任仁发笔”，下钤“任氏子明”印。

有统计，现今流传于世的任仁发作品共21幅，画风追求工细古雅，有晋唐之风，为时世所重，分散藏于国内及英、美、日博物馆和美术馆。

2016年12月4日，他的代表作《五王醉归图》亮相保利拍卖，最终以3.036亿元成交，创下当年中国艺术品在全球的最高成交纪录。这幅作品在元代文学家顾瑛的《玉山璞稿》（家翁命题任月山五马图）中也有明确记述：“月山道人写唐马，笔力岂在吴兴下。此图五马更为妙，乃为月山居士写。居士平生好奇古，投老读书深闭户。”

任仁发的代表作大多以马为主题，如《出圈图》《二马图》《贡马图》《神骏图》《三骏图》《九马图》等，在现存为数不多涉及任仁发的元代文献中，也可找到记载。如元末陶宗仪撰《书史会要》（卷七）记：“任仁发，字子明，号月山，松江人。官至都水庸田副司。以画马得名。中年后方意学李北海书，即得其法。”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杨维禎、钱惟善与任仁发也有交往，在《铁崖诗集》《江风松月集》中都留有题跋。

任仁发的儿子贤才、贤能、贤佐、贤德与孙子任士珪皆擅长绘画，尤其是鞍马图。任氏家族的马画多横式构图，这可能也与任仁发奉诏为朝廷画贡马图的经历有关。

任氏作为青龙望族，也为家乡做了诸多贡献。据杨维禎《东维子文集》（卷二十隆福寺修宝塔并复田记）记载，始建于唐长庆年间的青龙镇隆福寺宝塔（现通称青龙寺塔），在元大德、致和、至正年间，分别由任仁发及其子孙捐资修葺，同时还斥资复建寺庙周边廊屋及田地。另据任仁发密友黄庚《月屋漫稿》（寄月山太守诗）所言，他在主政崇明州期间，也是“下车方数月，早已政声驰。太守一身瘦，东川百姓肥”，可谓有口皆碑。

2018年9月，元代任仁发家族特展在青浦区博物馆举行。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面反映任仁发家族遗存文物状况的《月朗山高：元代青浦任仁发家族文物集萃》。为纪念这位对江南地区水利疏浚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也是“下车方数月，早已政声驰”的任仁发，在松江浦东夏村的“浦江之首”国家3A景区内还建有任仁发雕像。

2025年末，笔者前往青浦区重固镇新丰村，在高家台自然村的田间看到紧靠村道的任氏家族墓遗址，还基本保持着20世纪50年代时的形态。寻访村民得知，每年清明都有祭拜者前来。周边的村舍早已沧桑巨变，只有不远处的青龙宝塔依然矗立，静静地讲述着千年过往。

上海蓝天经济城

南翔游戏谷

- ◆ 游戏产业集聚区 ◆ 充足空间规划
- ◆ 优质配套政策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朱先生 18918526217 张先生 13661404363

南翔·元谷 文体旅元宇宙生态区

- ◆ 南翔古镇新地标 ◆ 租金减免

联系电话：金先生 13651936939

总部地址：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655号
总部热线：59129999 59122222

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刊登内容

遗失声明	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清算公告
减资公告	分立公告
吸收合并	房屋征收
产品宣传	各类启事

承接地址：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传真：021-52920283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著

1947年1月16日，周恩来曾电告刘晓等人，为了更有计划地领导国统区群众爱国民主斗争的斗争，中央认为国统区党组织有调整的必要，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将刘晓、钱瑛两处所管的秘密组织系统，统一管理。分局下设上海市委。上海分局以刘晓、钱瑛、刘少文及另由刘晓从上海党委中推荐一人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国统区秘密党的工作。上海分局直属中央领导，当时刘晓除向中央推荐刘长胜参加外，还曾推荐3人为分局委员。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

5月6日，周恩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致刘晓等人，告以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局。通知指出：为加强和调整蒋管区我党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上海局仍以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即刘少文）4人组成，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在目前较严重的环境中，上海局会议以愈少开愈好。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原刘晓推荐的3名同志，即分别在上海局领导下由张承宗分管上海市委，张执一分管外县委员会和策反工作，张登（沙文汉的化名）分管文化统战工作。中央在组织上成立了城工部和上海局，加强了国民党地区党的领导。

中共上海局十分关注吴石对时局的态度，开始了联络与争取他的工作。这里应当提到中共上海局负责人与吴石将军的最初会面。这次会面的牵线人

是吴石的挚友何遂。何遂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何遂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瞒，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何遂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联系。何遂把他的政治情绪及动向向中共上海局张执一作了汇报，由他转陈党组织的领导人。党组织很重视吴石这个社会关系，试探是否愿意公开见面，吴石很爽快地接受了。于是由何遂出面，约吴石见面。

1947年4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以及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与引荐者何遂以及何遂之子、中共地下党员何康在华懋公寓（后为上海锦江饭店北楼）会见并宴请了54岁的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这是吴石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始。

4月，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在华懋公寓进行着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上海局负责人之间的特殊会面。在何遂、何康的安排下，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以宴请的形式与吴石进行了面对面交流。一开席，何遂将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分别介绍给吴石。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何遂、何康悄然退席，在饭店门口静静地等待着，约一个小时的光景，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吴石一同走出饭店，微笑着道别。这时，何康很快意识到，吴石与党确立了某种联系。受党的纪律约束，他不便询问。之后，何康接到组织的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线联系。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让吴石的政治人生有了转折。这一点在吴石地下工作助手吴长芝的回忆中提及：“1947年春，吴石秘密地给我看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也明确告诉我，何遂同志方面是正确的革命途径。为了革命纪律，他和我分工，民联方面由我保持与吴石单线联系，并充当桥梁。”

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与吴石联系的秘密联系点安排在何遂寓所。何遂寓所位于上海愚园路，其门牌号为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两层西式小楼，何遂夫妇与儿子何康一家住在一起。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何遂身上的金字招牌，为开展地下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联络点，由张执一和何康与吴石联系。在这里，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至于谈些什么，由于两位当事人均不在世，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过接触，吴石对中共的信任日益加深，也答应为中共做工作，主动提供中共急需而重要的军事情报。

历史上出神入化的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中共在南京、上海建立的一个情报组织，由中共在延安的中情部直接领导。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在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吴克坚谈话，要他到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继续做党的地下情报组织、领导工作。李克农说：“我管的这摊事，货架上现在是空空的，全靠你们去拿东西来。国民党那儿，有许多空子可钻，你是很有经验的。”

中情部还为吴克坚配备了电台和译电人员。吴克坚于1945年10月随周恩来回到重庆，1946年赴上海。

吴石常常住在上海陕西北路669号民联成员吴长芝夫妇家里，得到情报后，由吴长芝立即送到南昌路善庆坊吴艺五家里，再由其交给吴克坚。

1953年9月，国家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李济在《悼念陈宝仓同志》一文中，透露出吴石地下工作的使命与任务，1949年春，“由陈宝仓同志搜集匪帮各种军事重要情报，交由吴石同志转送香港中共负责人参考”。

(二十三) **连载**